

發展體制、侍從主義與公民實踐： 一個原住民小山村的後發展啟示

夏傳位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社區發展文獻通常挑選成功個案來檢討利弊得失，本文反其道而行，透過勾勒一個原住民小山村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討論一個「被教導應該如何發展」、但各方面條件都不甚俱足的小山村，在追尋發展中碰到什麼樣的困難與陷阱，他們又得到與失去什麼。從「後發展」的提問起始，本文發現邊陲山村被再現與建構為「低度發展」的狀態，乃透過三個不同領域相互嵌合的論述叢結支撐起來：公民社會論述、政治學侍從主義研究、發展論述。它們共同預設一系列進步／落伍、現代／傳統、公民社會／侍從主義的區別，支撐著主流論述將當代鄉村展演為政治上黑金橫行、經濟社會上低度發展的地方。然而，研究發現，侍從主義作為底層民眾爭取權益的政治策略，在民主轉型下的賦權與問責可能性被低估；連帶也低估了在地公民團體的潛力與經濟多樣性。於是，解構外來進步論述，同時對社區能力與資源「再構框」（reframing）與「再敘事」（renarrativizing），我們將會看到邊陲社區也存在著豐富的另類可能性。

關鍵詞：後發展、新自由主義治理性、侍從主義、公民社會

台灣社會學第 41 期（2021 年 6 月），頁 143-193。DOI: 10.6676/TS.202106_(41).05

收稿：2020 年 10 月 8 日；接受：2021 年 7 月 22 日。

* 通訊地址：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Email: xia0616@gmail.com

Development Regime, Clientelism, and Civic Practices: A Post-developmental Reflection on an Aboriginal Village

Chuan-wei Hsia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By sketching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an aboriginal village on the mountainside of Kavulunga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development” was interpreted and pursued by villagers in an “underdeveloped” situ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brought by local transformative actions. Rather than selecting a few successful cases for emul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case that resulted in “failure”, asking what positive lessons we can gain nevertheless. From a post-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underdeveloped” condition of this village was represent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distinct fields of discourses, i.e. civil society discourse, political studies of clientelism, and development discourse, which all presupposed dichotomies of Progress/Outdated, Modern/Premodern, Civil Society/Clientelism, representing the countryside as politically corrupt and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But as survival strategies of the subaltern, the value of democratic clientelism for empowerment and accountability was underestimated. Deconstructing the three discourses goes hand in hand with reevaluating clientelism, and is also part of reframing and re-narrativizing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positive sense.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versity and vitality of community capabilities, a space for alternative actions grows.

Keywords: post-development,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clientelism, civil society

一、邊緣社區也可以有啟發嗎？

山櫻村是屏東縣 185 縣道沿山公路上的一個排灣族小山村。日本殖民統治者在 1930 年代將筏灣及瑪家兩個聚落群的部分居民強制合併，遷移至山腹地帶；1940 年再遷移至山腳現居地，成為今日的村落。山櫻村夾在 185 縣道和溪流之間的狹長地帶，沿著陡峭的山坡及河邊地布滿了櫛比鱗次的房舍及蛛網般蔓延的小徑，外人進入有如迷宮。狹窄彎曲的巷弄是稠密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網絡經年累月發展下來的結果，抵禦著國家理性化、現代化力量的入侵；但山櫻村也是國家力量塑造、協商與對抗的結果。

山櫻村的空間環境即展現了國家力量的穿透。周邊兩處「傳統領域」長期被國家占用：首先是一處知名的國家風景區，被劃歸為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並被 BOT 出去由私人公司負責經營；另一處是國軍特種作戰部隊駐紮的營區，過去也曾是山櫻村民的耕地與活動範圍。結構力量切割、劃定了山櫻村的活動界線與自我認同。此一事實對「發展」也有重要意涵。

山櫻村的經濟生活就像許多原住民部落一樣，靠年輕人在都市工業部門的工作維持。但自 1994 年文建會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後，以「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等手段來發展經濟逐漸成為公式，被各地社區競相模仿（梁炳琨、張長義 2005；江大樹、張力亞 2008；呂欣怡 2009）。這股風潮也在多年後終於吹到山櫻村，透過大眾媒體與國家力量的中介，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的「農村再生計畫」及近來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的「地方創生計畫」，村民開始有了社區「發展」的慾望，而此一慾望又很自然地與觀光旅遊綁在一起。

山櫻村在發展慾望與實現的可能性之間，明顯地存在著矛盾，而這又與國家不同的統治目標相關。一方面，國家各種由上而下推動的計畫植入發展的正當性及可欲性，並且藉由課程散布成功案例與主流

發展策略；另一方面，這些策略之實現，不論是由國家官僚或在地菁英所提出，都碰到國家禁制區的規定而難以突破，例如從村落修築步道穿越國家風景區至舊部落，或者利用特戰部隊的廢棄設施來從事軍事文物觀光。這尷尬地凸顯了有潛力的觀光資源都早已被國家徵用的事實。山櫻村的困境其實折射了國家交錯運用「霸權」（hegemony）及「武力」（force），或說同意（consent）與強制（coercion），兩種手段的矛盾（Gramsci 1971; Anderson 1976），前者在於收買人心與創造共識，後者在於維持權力與有效控制。

於是，比起許多社區研究聚焦成功案例以模式化成功經驗，山櫻村的「發展」在醞釀階段就困難重重。邊緣社區是否可以帶來不一樣的啟示？後發展研究（post-development studies）強調「發展」是論述與權力部署的結果，是一種具有特定暴力效果的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Ferguson 1990; Escobar 1995）。山櫻村的經驗凸顯了發展計畫與國家暴力之間的隱蔽連繫，也指向「發展」概念本身及其機制需要批判檢視。然而，台灣是國際間少數成功發展的個案，過去的發展研究意在解釋「奇蹟為何發生」。於是，儘管遍地開花的「文化觀光化」發展策略中，注定只有少數明星社區能夠勝出，但眾多失敗個案仍不足以撼動「發展」本身的正當性，檢討層次仍在如何提出更新的發展策略，近年火紅的「地方創生」即是一例。

另一方面，學界關於地方發展經驗的反思，關心社區內部自發的動力，由下而上創造出另類發展策略與實踐，分析焦點置於後工業、後現代的文化政治，例如觀光客凝視如何影響社區的自我呈現（呂欣怡 2009；張瑋琦 2011），公民社會「公共性」的建構與爭奪（吳介民、李丁讚 2005；容邵武 2013；楊弘任 2014），共享資源如何管理（洪廣冀、林俊強 2004；湯京平、呂嘉泓 2002）等等。雖然這些文獻中不乏對國家及市場力量引導或扭曲社區營造方向的批評，但基本上仍視「發展」為一個由下而上培力的自然過程，並未視作知識／權力的構造而加以解構或置疑；分析對象亦是成功、或至少展現進步力量的個案，顯示發展慾望對於研究案例揀選的影響。然而，像山櫻村

這樣缺乏強力的改革領袖、侍從主義牽連不清、派系與世代間紛爭不斷，是多數邊緣社區的特徵，當這樣「低度發展」的村落被鼓勵、勸誘、教導進入發展的競賽遊戲，會發生什麼事？又會有什麼樣的後果？進一步而言，失敗案例的意義是什麼？該如何理解他們的發展經驗，以及發掘其潛力與能動呢？在平靜、缺乏內在改革動力的小村落，也有另類經濟實踐的空間嗎？

以下先從解構存在於公民社會論述、政治學侍從主義研究、發展論述三個領域中共同預設的現代性二元框架開始。一系列進步／落伍、現代／傳統、公民社會／侍從主義的區別，支撐著主流論述將當代鄉村展演（perform）為政治上黑金橫行、經濟社會上低度發展的地方。然而，藉著重新詮釋當代侍從關係在鄉村的開放、轉變意義，視之為底層民眾在有限資源下的生存策略，我們將看見，一個被認為停滯落後的邊緣山村其實也存在著「對抗性公共領域」（counter-publics），以及被壓抑、忽略的公民實踐與經濟多樣性。

二、文獻探討

我們對於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的理想與準繩、甚至於描述它們的語彙，都來自西方具體歷史經驗。“civil society”這個概念是歐洲現代性對其歷史的自我反思，但是在「公民社會」的全球擴散過程中，卻有如脫韁野馬般地偏離歐洲典範，在具體歷史實踐中展現為各地社會的殊異性，導致認知的迷航與困境。Kaviraj（2001: 289）如此鋪陳此一困境：西方的理論語言具有普遍性，我們無法不以西方概念來理解自身社會在現代世界的發展變遷；但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現實卻是西方理論語言的不完美折射，實際行為與西方語境脈絡中相應概念所預期的意涵往往扞格不入，在描述世界的語言與其指涉對象之間出現了極大落差。

於是，在第三世界探討公民社會無法不面對語言與對象落差的問題，成為重新問題化的起點。有兩種探討差異（difference）的方式：

其一是預設西方模式具有規範普遍性，進而探究差異的原因及縮小差異的實踐策略；其二是將差異視為運用模式打造現實的必然產物。一方面模式透過展演性（performativity）確實縮小與現實之間距離，讓彼此更加近似；但另一方面現實永遠次於標準，比模式更多或更少，我稱之為「脫韁經驗」。此時聚焦兩者之間的差異，為的是留意模式之「展演性」及其非預期後果，以更闡明脫韁經驗的獨特性，看見底層民眾的行動力，以及在地公民社會的演化軌跡，並不預設普遍標準。以下依序討論這兩種模式。

（一）脫韁的公民社會

第一種模式是對差異採取規範立場，通常會問以下問題：「為什麼台灣社會沒有公共輿論呢？」（李丁讚 2004a: 1）。湯志傑（2006: 185）提到，這種問法總是問：「『有沒有公共領域』……這種『什麼』的問題，而較少問『是怎樣的公共領域』、『它如何起作用』、『起了什麼作用』這種『如何』的問題。」其結果是「後進的公民社會總是以負面的方式被衡量，它與典型的模式比較之後還有那些匱乏不足的地方」（Hann and Dunn 1996: 22，轉引自容邵武 2013: 63）。

規範立場也會滲透進經驗研究中。經驗研究回答「如何」的問題，細緻的經驗研究甚至避免以負面的方式衡量後進社會，但現代／傳統、公民社會／侍從主義等二元框架仍發揮了認識論的指導作用。例如，李丁讚（2004b）分析新港文教基金會推動的中山路美化案，雖然是進步的公民行動，但是由於沒有認真細緻地去傾聽當地民眾基於傳統習性的私人利益與感受，以致公共說理與溝通失敗；吳介民、李丁讚（2005: 126-127）以「民間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對張作為分析基礎，前者是基於「私人利益、常識、情感、族群語言、文化慣行等日常生活經驗所構成的常民世界」（「搏感情」）；後者則是說理辯論（「講道理」），一個公共領域的締造，需要說理者透過公共修辭的展演以兼顧二者。楊弘任（2014）認為社區動起來的關鍵，在於「公共行動社團」與「村落傳統組織」之間形成有效的文化轉譯。

純粹的「村落行動」以實作為優先，無能帶入新價值與新社會想像；純粹的「社團行動」以論述為優先，無法感動生活在既有文化習性下的民眾，兩者單獨都無法使社區動起來。

上述三篇研究都強調在地經驗、情感與文化習性在公共討論與行動中不可被忽略，反對公民團體自以為是的「道德的、現代的和專家的優越性」（李丁讚 2004b: 380）。但也很明顯，真正掌握變革能力（agency）、領導目標與方向的，是公民團體或公民社會；被潛移默化要變革的，是村落傳統組織或民間社會。從研究者總是對公民團體課以更多責任也可看出，兩者之間是帶領與被帶領的關係。這至少是低估了，現實中多種社會文化傳統都能體現權力制衡與互惠團結的價值（Goody 2001），一般人民透過日常生活實踐也有公民潛能——例如 Scott（1985）所謂「弱者的武器」展示東南亞農民社會中隱蔽的「對抗性公共領域」；實踐鎖鑰未必僅掌握在較能模仿西方範本的現代化菁英手中。

公民社會論述的關懷與試圖處理的經驗議題並非不重要，它們更好被定位在「後殖民現代性」（postcolonial modernity）問題叢結之下，反映後殖民國家在民族主義追求中，動員全社會力量仿效先進國家的現代化與進步文明；而社會上的菁英與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為公共領域從萌芽邁向成熟的領導者和籌謀者。這類研究的貢獻是從社會菁英淑世的角度，研究如何改善社會改善計畫，以便能更自覺地在手段與目標之間協調一致。

第二種模式則跟隨後結構、後殖民主義對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重視，轉換霸權與差異的關係，不再從中心的視角將差異視為霸權的匱乏、偏差或補充，而是正視差異創造歷史的能動。套用 STS「對稱原則」的術語，就是「行動能力不只來自單一霸權，也來自多重世界的交錯……不只研究可見的代言人，也要了解不可見的弱勢者」，如此方能看見弱勢者的行動能力（林文源 2014: 27）。

Chatterjee（1947／田立年譯 2007: 62-90）關於加爾各答南部鐵道沿線公共土地非法占居棚戶的研究，是一個經典案例。這是一群公

民地位曖昧、活在合法與非法邊緣的人，他們雖不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卻也並非與之無關：他們為臨時組建的共同體賦予某種道德內容，並類比好（proper）公民而要求在城市邊緣生存與居住的權利；他們的政治機會來自於擴大的民主體制，因此政府不能單純無視其要求並驅逐之。這個群體不能用某種與現代對立的「傳統」範疇來理解，他們體現了第三世界大多數社會的非西方現代性道路之殊異、混雜樣貌，從菁英的眼光看，永遠如脫韁野馬般長出各種不符規範的社會形式、行為與制度。

相對於 Chatterjee 探討公民身分存疑的非法占居團體，本文的對象是法律身分確定，並在國家誘導、生存壓力與主動模仿之下捲入以西方公民社會為範本的邊緣社區。研究對象的不同，使我不擬緊隨 Chatterjee（2001: 172）的理論用法，將「公民社會」保留給一小群現代化菁英團體，而將非法占居者介於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灰色世界，稱之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山櫻村居民無疑是公民社會的正當成員（雖然出之以種種脫韁形式）。此外，將脫韁經驗也納入公民社會的指稱範圍，正足以鬆脫該符指與西方範本的緊密鏈接，看見多樣的現代性發展軌跡。

山櫻村的轉變軌跡也無法用現代／傳統、公民社會／侍從主義等二元框架來捕捉。例如，該村最接近標準定義的「公共行動社團」仍與派系、選舉及家族人際網絡有著複雜牽連，而這正是部落集體意識的重要組成介面；村民在選舉投票與人生抉擇上既保留家族的認同與羈絆，也愈來愈展現個人自主決定；對權利意識與民主制衡手段的嫺熟毫不違和地與侍從主義式的關說、利益交換交互為用。它是現代性計畫的產物，卻又不符合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從另一面來看，它既現代又傳統，既公民社會又侍從主義；村民在兩個文化世界中穿梭來回，將斷裂而不同來源的歷史脈絡、傳統、制度與文化技巧拼湊在一起，以回應現實環境的挑戰。

（二）脫韁經驗與發展體制

重新思考發展的意義與另類出路，後發展研究是重要起點。它的核心提問是：「發展」為何變成一種強制性、難以質疑的思考模式，成為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第三世界國家又如何被再現為「低度發展」，如強迫症上身般地攀爬單一發展階梯，其結果卻是以發展之名布建出廣泛施加於人民身上的權力之網？

後發展研究從 Foucault 知識／權力的命題出發，指出發展經濟學的知識應用到第三世界時具有高度的權力意涵：讓專家對人群做出診斷，將各樣的處境和行為變成一個能夠接受特定藥方、被看見的現實（a visible reality），並讓某些事物看不見；其次是創造一個體制性領域，透過計畫、專家小組與顧問進行介入，組織所有能被看見與不能被看見的事物，達到分類、監控、管理、矯正人們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目的（Escobar 1995, 1988: 44-45）。

這是一個創造和維持真理政治（politics of truth）的過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涉及再現被治理者的認識暴力（epistemic violence），表現為一系列二元對立如開發／未開發、現代／落伍、公民社會／侍從主義等。由權威學科知識創造的差異和階序，不僅將底層人民再現為貧窮、懶惰、愚昧等等便於權力施作的對象；也創造出主體經驗，被治理者對自身的「低度發展」感到羞恥，再也無法想像經濟成長以外的另類發展道路。

後發展研究雖然強力批判發展論述的認識暴力，卻沒有概念化底層民眾的轉變能力，又預設主體經驗完全受制於知識／權力的捏塑灌輸，某種程度也就在知識上永久固著化霸權關係，除了全盤接受或拒斥發展主義之外，看不到其他另類可能。

正是在這點上，差異（或脫韁經驗）再度扮演概念化底層民眾能動的重要角色，因為如同上述，知識／權力運作將差異編排入二元對立以掩蓋內在霸權體系的斷裂、偶連與不確定，維持同一與重複。於是，逆向操作就是要重新解讀差異，使其脫離二元體系編排的低位或負項，看見它促成新事物在體系內部斷裂、偶連的縫隙中茁生的可

能性。Gibson-Graham (1996, 2006, 2008) 從後發展理論銜接女性主義，沿此軸線大大拓展了我們對另類經濟空間的思考。

Gibson-Graham 的第一個逆向操作，就是提出「經濟多樣性」(diverse economies) 概念。她們論證，另類經濟之所以難以想像，是因為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自足、完滿並涵蓋整個社會的體系。如此一來，任何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安排都被認為是不可行與臆想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就像女人家務勞動在 GDP 計算中沒有被看見一樣，即使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依然存在經濟多樣性，也沒有被看見。例如，在交易領域並非只有資本主義市場，也有另類市場和非市場；在生產領域，並非只有薪資勞動，也有另類薪資勞動與無薪資勞動；最後，在企業組織領域，並非只有資本主義企業，也有另類資本主義企業與非資本主義企業。在大多數國家，一半以上的經濟活動都是非資本主義、非市場性質的，可見當前經濟論述的暴力 (Gibson-Graham 1996: xi-xv, 2006: 59-67)。

看見經濟多樣性即是看見被體系壓抑的差異與慾望。Gibson-Graham (2006: 144-152, 165-178) 第二個逆向操作，是讓差異轉變為促進新主體位置、新認同、新能量和新慾望的脫韁經驗。這涉及對社區能力與資源的再構框 (reframing) 與再敘事 (renarrativizing)：從負面表列到正面表列。所謂「負面表列」是從資本中心的角度盤點社區資源及主體經驗，再現為匱乏和外援，例如破損的基礎建設、沒有大型工業、缺乏技術等等，解方經常是：工業化、政府補貼、吸引投資、人力訓練等等。負面表列也與僵固的主體位置有關，例如失業工人陷入被遺棄絕望與憤怒抗議的循環中，固守著舊認同，抗拒轉向社區經濟的新主體位置。

「正面表列」即是對社區能力與資源自我肯定的過程，導向肯定多樣的經濟活動、認同與需要，也解放被壓抑主體的經驗與慾望。Gibson-Graham (2006: 134-144) 記錄邊緣社區成員的焦點團體對話，證明流動的慾望及身體實作總是溢出發展論述規限的主體位置之外，帶來另類可能。這種轉變源自於對話者與正式經濟的認同關係發

生改變，邊緣社區不再將自己視為發展的匱乏者及受害者，而是充滿能量及技巧。Gibson-Graham 強調社區發展是基於這些強項與資產，而不是匱乏與外援。社區雖然也可以接受外援，但必須是次要選項，同時前提是居民能先充分討論如何管理與分配多餘資源。

Gibson-Graham (2006: 166, 169) 認為，發展是倫理辯論與決策的產物，發展藍圖須因地制宜，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公式。因此，她們提供的並不是一套實質的另類發展藍圖，而是一套反思與發現藍圖的方法。這也讓另類發展的可行性判準回歸社區內部相互協商、對話與承認的「政治—倫理」決策空間。

這樣的空間如何可能？西方女性主義者在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爭取發言權的策略足以提供參照點。長久以來，女性主義者批判公共領域中主導的語言、風格與行為規則有利於特定優勢群體，也就是布爾喬亞階級文化霸權 (Fraser 1992: 119)；公民社會論述跟發展體制一樣，都具有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與再現的認識暴力 (Somers 1995)，並排除、壓抑與收編差異 (Benhabib 1992; Eley 1992; Ryan 1992)。女性主義者也認為 Habermas 將公共領域視為單一是錯誤的，任何時候都存在著競爭的「對抗性公共領域」，包括國族、底層農民、女性、工人階級公共領域等等，提供另類的行為與風格標準 (Fraser 1992: 116)。

於是，女性主義者藉由挑戰公／私之分，將被隱蔽、壓抑的事物檯面化，讓公共領域扮演「揭露世界」(world-disclosing) 的功能，以重新界定利益與認同 (Calhoun 1992: 35)。類比地說，尋求另類發展的主體轉變能力，同樣也需要解構公民社會論述的二元對立，看見公民實踐的脫韁經驗並使之檯面化，以凝聚另類發展的集體行動共識。

(三) 侍從主義作為公民社會？

回到台灣社會的脈絡，長期主導台灣地方政治的認識範疇是侍從主義。公民社會論述建構在它的對立面之上，底層民眾的脫韁經驗往

往被簡單歸類為傳統、停滯、落後的那一邊，否認潛在變遷的可能。解構公民社會／侍從主義這組二元對立，是重新看見邊緣社區潛力的重要步驟。

侍從主義最初被引入觀察台灣政治，意在解釋「為何一個在中國失敗的政黨，可以在一個敵對的島嶼建立長久的政權？」（Wu 1987，轉引自王金壽、翁立紘 2019）。答案是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藉由與地方派系建立恩庇侍從關係，將控制深入基層以鞏固政權。侍從主義被認為是台灣地方政治腐敗的根源，政治人物透過長期經營的人際網絡，將政策利益輸送給地方支持者，交換後者的選票支持（丁仁方 1999: 60）。由於威權政府可以動用司法、情治資源監控以確保恩惠轉化為選票，並讓背叛者付出慘痛代價，又沒有反對黨與媒體的監督，因此對追隨者來說，這是一種混雜強制與利誘的不對等交換關係（Hicken 2011: 293；王金壽、翁立紘 2019: 129）。上述觀點又可稱之為「選舉侍從主義」或「威權侍從主義」，強調的是體制透過交換關係層層節制並自我維持的特徵。

有趣的是，對待從主義的觀感很少隨著政治環境變遷而改變。有學者即抱怨，「侍從主義」概念似乎恆常地保持傳統、落伍、前現代的形象，幾乎民主化過程中的壞事情都歸諸於它（Gay 1998）。近來修正派學者注意到，侍從主義作為一種特殊交換形式有很強的適應力，不僅橫跨各種文化脈絡，也可以在民主體制內繁榮；在新環境下侍從主義的形式與意義出現轉變，交換關係可能從垂直從屬的形式轉變為水平互惠，同時政治競爭也讓追隨者可以透過更換恩庇主而達到某種程度監督、賦權、伸張公民權利的功能（Fox 1994, 2012; 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 Hicken 2011）。

這相當程度鬆動了過去對於侍從主義的觀感，但原先定義上需要在民主體制與侍從主義體制之間做出清楚二分的強制要求並未消失，例如民主政治中的政客也透過公共政策施恩予特殊選民並期待選票回饋，該如何與侍從主義區隔？修正派的答案是：侍從主義政客有辦法對不回報做出制裁（隱含可監視及撤回恩惠），民主體制政客則否

(Hicken 2011: 291, 294)；這形同又將侍從主義推回民主體制的反面，造成更多的混淆與爭辯。一種可能的回應是：這是基於理念型的刻劃；不過這項刻劃對於釐清現實的效用值得懷疑，如同本文的田野調查所示，在實際民主競爭中，即使無法確保恩惠的回饋，恩庇侍從關係仍持續經營。

台灣政治學界也出現了類似的爭議。隨著民主化日趨成熟，政治學界過去宣稱地方派系已名存實亡（王金壽 2004）。¹但國內學者最近跟國外修正派一樣，證實侍從主義式的交換仍然活躍卻性質轉變。例如民進黨執政的台南縣、市政府福利政策擴張，都是沿著侍從網絡布建且針對特定團體，雖然是附條件（contingent）恩惠卻不具強制性，包括社福團體經費補助（丁仁方 1999: 74），以及社區營造經費、敬老津貼、老人全口假牙補助（丁仁方等 2018: 48；湯京平、陳冠吾 2013: 117）。

這引發王金壽、翁立紘（2019: 132-133）的質疑：那究竟是侍從主義政策還是民主政治常見的綱領政策（programmatic policies）？兩者區別就如上述：侍從主義著眼於選票利益才實行福利政策，所以會刻意排除那些不會投票支持的人；而一般綱領政策只問潛在受益對象符不符合資格，不問投票意向，故無法排除不投票支持者享用。既然這些福利政策都是不排他的，怎麼可以歸類為侍從主義呢？但另一陣營則認為，這些政策都是沿著侍從網絡布建並鎖定特殊團體選票，不同於綱領政策的普遍主義傾向，也成功了，自然是侍從主義（丁仁方等 2018: 55）。表面上這是「現象如何定義與歸類」的問題，卻仍不自覺預設二分架構在認識論上的效力，掩蓋更深刻的歧異：我們要沿用二分法看待新現象，還是用新現象來挑戰二分法？當我們堅持在「侍從政體」與「公民政體」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時，其實是無

1 但究其實，所謂地方派系的「瓦解」，並不是指恩庇侍從關係不存在，也不是指在地方選舉競爭中不再分派別或路線，並利用樁腳動員及買票；而是指國民黨過去用來維繫其政權的選舉買票機器已經四分五裂了。具體指涉是從縣級到鄉鎮級地方派系之間層層節制關係的斷鍊，或所謂「金字塔型權力結構」的瓦解，結果是「一大堆金字塔所崩落下來的石塊」，亦即地方派系的山頭化。參見王金壽（2004）。

法接受公民社會在西方範型之外有多樣化的制度實踐。

Piattoni (2001: 3) 即指出，考察侍從主義不應預設體制理念型間的絕對對立：「政治的本質就是特殊性的，不同政體的差別只在於特殊利益如何表達、促進以及整合而已。」她另指出，侍從體制只是一種利益表達及促進的特殊歷史形式，並非扭曲的發展狀態，它構成解決民主表達問題的一種「務實方案」（轉引自丁仁方等 2018: 47-48）。

相較於政治學從體制的結構特徵來觀察侍從主義，人類學更傾向從政治的人際互動網絡與非正式權力運作著眼。事實上，在 Scott (1972) 討論侍從主義的經典文章中，一開始表述其問題時，就認為恩庇侍從關係的勾繪，可以超越以「普遍階級利益／特殊原初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s*）的二分法來理解人群組織與政治行動；同時在原定義中（Scott 1972: 94-95）不只強調以保護與好處交換支持和服務，同時亦強調此一「工具性友誼」仍須涉及信任與情感，同時相互間角色期待必須獲得社群價值與儀式的支持，亦即依賴在地觀念。但由於自我設限適用範圍在前工業、非西方社會，於是又跌入二分法的窠臼。

但人類學將侍從主義視作跨政治體制的普遍現象仍值得重視。例如鄭瑋寧（2019: 300）並未將台灣 Taromak 魯凱族的恩庇侍從政治歸結為國民黨威權政體的產物，反而溯源至東南亞普遍存在的權力靈力觀（*potency*）；正因為貴族具有神賜的靈力，所以具有徵稅權力並與居民進行（再分配與照顧的）交換。當日本殖民者與國民政府相繼出現，啟動「政治國家化」的過程時，Taromak 魯凱人用在地文化範疇來理解、適應現代國家，通過侍從主義交換承認外來者乃上位者，並將之納入社會階序之中（鄭瑋寧 2019: 306, 309）。這顯示侍從主義是一個高度彈性的權力形式，在政權轉換之際為不同行動者提供生存策略與微觀權力互動的劇碼（*repertoire*），一方面轉譯結構力量，另一方面亦是具轉變潛力的歷史實踐。

跟本文直接相關的是石磊（1969, 1971）對筏灣聚落群所做的研

究。該部落乃山櫻村的源流之一，以「團」為主要的政治結構。² 石磊（1971: 141, 145）認為團主與團民之間是一種「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即恩庇侍從關係。既然原住民的恩庇侍從關係有文化上與歷史實踐路徑相依的淵源，那麼它也不會因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垮台而終結，在新環境中以轉變的角色與功能形式出現。

晚近人類學研究更凸顯侍從主義在民主化之下轉變的一面。例如，侍從主義可以被群眾用來自主地表達利益（Fox 1994）、追求集體目標（Burgwal 1995），甚至也傳遞尊重、效率、問責等政治價值與意識形態（Gay 1998: 15）。Auyero（1999）在拉丁美洲的研究發現，以樁腳為核心建立起的複雜社會網絡，也類似公民社會團體般發揮功能。Anciano（2017: 606-607）對南非開普敦 Hangberg 區拆遷戶維權組織的研究，發現這些組織混合了公民社會與侍從主義的雙重運作邏輯和特徵；侍從主義也潛在可能扮演一種「參與式諮詢」（participatory consultation）的政治管道，樁腳將民眾的需求反映給政客，讓後者對人民的需求做出回應。

我們將在後面看到，即使像山櫻村這樣的原住民小山村，侍從主義也在急速轉型中，政黨、地方政治菁英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出現極大變化，這對發展體制、國家／社會關係，以及公民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參與公開儀式及公共討論場合進行觀察為輔，訪談對象包括村辦公室人員、社區發展協會幹部、主要

2 「團」跟土地所有權習習相關，是地主（貴族）所控制的半獨立政治社群。筏灣的土地分為五家地主所有，沒有土地的貴族或平民必須徵得地主（團主）的許可，始能在住宅區內建立家屋開始家庭生活，並受其管轄。在經歷日治與國民政府長期的「政治國家化」歷程之後，包括廢除農租和獵租，集團移住與土地國有化導致貴族喪失土地、河流與獵場，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等，「團」的組織功能已經消逝，「團主所剩下的就是些僅能參加團民有關的個人的儀禮以及團民對他的尊敬了」（石磊 1969: 214）。

政治派系成員、重要社團成員與民意代表，以及目前仍在從事傳統耕作的農人等，共二十七人，為保護當事人，人名與村名皆為化名（參見附錄 1 訪談對象列表）。目的在於了解：村落中曾經有過哪些發展計畫及願景？誰在提倡？實施過程牽動哪些權力關係的消長、互動與轉變？而家族勢力以及派系構成與運作等又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另外，我也訪談從事維生耕作的農人們，注意這些活動鑲嵌在傳統文化規範、社會組織與分工的情形，農耕的主觀意義，以評估傳統經濟活動的韌性與構成另類經濟實踐的潛力。

訪談時，我會先跟訪談對象聊他們的成長背景、工作經歷、家族史，再逐漸切入他們的派系與政黨屬性、對村落重大爭議與公共事務的看法，參與社區組織的程度與心得，公／私分界與村落整體觀念，對不同政黨的印象，身分認同，最後是對村落發展的願景、發展計畫與路線的評論。但觀察重點並不在結構與範疇的穩定，而在茁生的變動趨勢。

另外，由於山櫻村的源流部落之一筏灣村在集團移住前原居地的早期情況，人類學者石磊（1964, 1966, 1969, 1971）曾經詳細記錄過，因此透過文獻今昔對照，能辨別出部落在社會組織與文化上的重要延續和變遷，亦對本研究提供了重要資訊。本研究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1.5 至 2.5 小時，每位受訪者訪問一至二次。田野進行期間為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以及 2020 年 6 月至 8 月。

四、歡迎搭乘發展號觀光列車

山櫻村民的發展想像及慾望，總是跟「外人」與「外地」有關。當 1940 年代因日人集團移住政策而遷居此地時，居民過的是混農林業自給自足的生活，只有在極少數時候需要使用貨幣（如繳學費及建屋）。1960 年代許多年輕人去高雄、台北工廠做工；1970 年代職業軍人成為選項；1980 年代搭上營建業熱潮，大量年輕人投入做鐵工與板模，日薪可達 2000 多元，許多人甚至開著賓士、BMW 回家，

至今仍是村裡年輕男人最主要的職業選擇。不過在上述諸般選項的變換中，本村或本地從來沒有成為發展慾望投射與凝視的對象。直到最近，分別來自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及水土保持局「農村再生計畫」的提議，開始將眼光放在本村。

最早的發展構想是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提出。管理處的職責是帶動風景區及周邊村落的觀光資源整合與發展，基於業務所需，希望能將附近山櫻村及牛角灣溪整合進來，由管理處出資修築生態步道連接風景區內的瀑布及各種休憩設施，再往上延伸至舊部落，構成完整的步道網；並建議村民護溪與整治環境，投入生態觀光事業，作為社區振興的主要途徑。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建議是一個相當流行的發展模式，不過對中、老年社區幹部而言，卻如醍醐灌頂般啟動他們對社區營造的規劃熱情。³ 在社區幹部的討論中，願景逐漸疊加膨脹，除了舊部落外，附近特戰軍營廢棄的靶場也在想像中美好地變成青年戰鬥營與軍事博物館的預定地。這聽起來有點狂想，但在村民的主觀認知中，特戰營區過去曾侵占村民耕地而無補償，因此村民認為在理想情境中，他們有權利用。⁴ 該構想獲得山櫻村民普遍支持。數年之後，仍有許多人對這個胎死腹中的計畫念念不忘，視之為最適合的發展願景。他們會說：「我們的自然資源本來是最好的，別人根本比不上，可惜是我們自己內亂。」

為何提到內亂？原來村民認為，國家風景區曾經「強制徵收」他

3 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麗珠回憶，最早以生態旅遊作為社區營造途徑的點子要歸功於風景區管理處的啟發。但村內年輕改革者（即下文提及的青壯派）早已經透過與外界的接觸見聞以及觀摩附近禮納里的商業成功，興起類似的念頭。

4 此處和後文的其他土地爭議一樣，需強調村民的認知跟土地政策演變無法完全銜接。造成扞格的可能原因非常多，土地權利是一個由複雜的法律及制度語言所建構的「事實」，村民無法運用這些語言來陳述，相關背景資訊闕漏等等，都會造成無法銜接的結果。另外，村民也可能從晚近新學習的「傳統領域」權利語言重新詮釋歷史，從而跟蘊含特定觀點的官方紀錄不同。村民的口述史並非真相，而是動身尋找真相的指引。循此，要釐清此處涉及的土地所有權爭議，涉及多面向、非常龐大的歷史重建工程，非本文所能承擔，也非本文重點。本文意在呈現村民對於土地所有權的集體信念，並指出此一信念會對行為產生哪些特定結果。筆者感謝本刊編委會讓我認識到台灣原住民土地制度演變的複雜性，從而以更謹慎的態度面對田野訪談資料。

們的土地，⁵長久累積的怨恨與敵意未解，因此當管理處提出為了修築生態步道還要再徵收土地時，立即引發許多人反彈。村民說：「管理處已經騙了我們一次，還要再騙一次嗎？」另外，外來理念與資源的誘惑，引發既有派系之間不同的策略回應。與當時社區發展協會敵對的派系人物寧願採取猛烈抨擊姿態以博取民意支持，並希冀藉施壓榨取更多的回饋金。理事長麗珠即認為，管理處是真心想幫忙，可惜村民有許多誤會，而敵對派系見縫插針，刻意誤導資訊，讓誤解愈來愈深，難以澄清。

雖然村民將失敗歸責於「內亂」，但顯而易見，失敗也跟村民認知的「國家強制徵收」有關。其實山櫻村可以從事生態觀光的兩塊土地，都歸屬國有：舊部落在民國五十幾年時就被片面公告為國有地，因村民不識字沒有提出異議而成為既定事實，⁶另一塊則是特戰軍營所有；這讓山櫻村的發展之夢名符其實只是「夢想」，沒人知道該如何跟政府交涉並排除障礙。原住民部落發展碰到國家武力的限制，山櫻村並非特例，但村民的反應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流行發展論述可能與村落的結構條件不符，村民發現要落實它超出能力範圍所及，但是村民檢討的是主觀意願不夠堅持而不是客觀結構限制。第二，村民在日常經驗中感受國家交錯運用「霸權」（hegemony）及「武力」（force）兩種手段。例如「騙」過他們的風景區管理處轉過頭又要幫助他們；村民被剝奪了舊部落的固有權利，風景區管理處卻可以承諾近用之。其中矛盾與不一致涉及官僚體系內部神祕複雜的協調過程，遠超過村民常識所能理解，但總效果似乎是通過發展慾望軟化了暴力，讓後者更容易承受。第三，正因為國家的內部程序神祕

5 在村民的敘述中，風景區的土地最初是由村民開墾，其中只有部分人聲請登記而取得土地權狀。早年風景區歸鄉公所經營時，協商由村民領取地上物補償。但管理處來了之後，以低價收購土地，沒有土地權狀的就直接沒收。

6 根據村民口述，這塊地民國七十幾年時，曾有鄉代以個別耕作人的名義要求返還該地，但由於沒有土地登記，無法證明所有權，協商後只得到地上物補償。最近幾年由於泰武鄉平和村原住民多次抗爭傳統領域被劃為國有林班地，加上蔡英文總統於2016年上台時曾承諾正視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並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於是舊部落土地返還已在處理程序之中，此議題超出本文所能處理範圍，在此無法討論。

難解，村民對於機構善意感到難以仰賴，因此存在榨取短期回饋比長期合作來得穩當的心態。第四，其實林務局自 2002 年推動「社區林業」（community forestry）以來，鼓勵社區民眾參與地方森林資源經營，已經開放社區在國有林班地上從事生態旅遊（盧道杰等 2011）（但村民一直將返還土地作為發展前提）。換言之，國家在「霸權」與「武力」的界線也會移動，但同樣涉及官僚規定與程序；有能力協調的人能夠將霸權的範圍弄得更寬一些。於是，能夠真正走通這條路的村落，需要專業人士作為中介寫計畫、申請經費，並且輔導協助執行。這種能力與資源在各社區之間的分配極為不均；從村民的眼光來看，先天能力不足就是要靠後天打好與政治代理人的關係，用關說、請託來疏通神祕的官僚體系以為彌補。

最後，即便困難重重，山櫻村民仍死守著發展願景而難以放棄，因為他們進入主流發展論述所引導的視野、概念框架與方法論之內，已經無法想像另類發展途徑。這就要提到農村再生班的作用。山櫻村參加再生計畫的時間從 2013 年延續至 2017 年底結束，透過講師的引導，發展願景整合進農村再生計畫的提案之中，獲得更詳盡的表述。

農村再生計畫共分「關懷」、「進階」、「核心」、「再生」四期課程。第一期課程的目標在教導村民從事有機紅藜的商品化耕種。隨著紅藜在全台掀起一片熱潮，許多已離農的山櫻村民最初都賺了一筆。但當平地漢人也加入競爭行列、紅藜市場愈來愈朝產業化方向競爭時，山櫻村的紅藜經濟便出現危機。村民的經營有幾項特徵：一、村民的市場資訊與管道稀少，大多只能依賴鄉公所跟外面廠家簽約契約；二、山坡地種植面積小，人力成本高，無法因應削價競爭；三、用傳統方式脫殼含有雜質，無法通過收購商的品質檢驗；四、要達到品質標準必須採用機械化脫殼，但村民欠缺資本。於是，很多人的紅藜都堆在倉庫裡賣不出去。紅藜經濟的失敗正凸顯後發展研究的批判重點：產業化的主流發展方案運用到邊緣社區經常出現反效果，也印證追尋另類發展道路的必要。

第二期以後課程是協助村民提出適合自己社區的發展計畫。農村

再生計畫是一套制式化、標準化的課程及方法，套用於所有社區。教師要求村民從自己社區的資源調查與盤點開始，逐步針對每一項發展課題（如景觀、產業、文化、生態、社區照顧等）做出優、劣勢分析及因應對策，最後提出一套社區整體發展的構想計畫。

雖然每一個項目的實質內容都是由村民討論並填寫（譬如產業項目下，優勢是「小米、芋頭、紅藜、樹豆」；缺點是「缺乏工具」；對策則是「申請補助、研發、設計包裝」），但討論架構及發展方向已事先確定，並且課程中教師拋出許多示範社區的成功案例作為參考，以致於看起來是一個由下而上、根據社區特殊稟賦與需要而討論出來的設計，實則結論大同小異，通過 Gibson-Graham 所謂的「負面表列」，要求政府資源的補助與介入，最終導向產業化、觀光化的既定目標。

正是在這個脈絡下，連結村落、瀑布、舊部落的生態步道又再度死灰復燃，並且更為周詳，甚至畫出了路線圖，對於沿線的生態景點、土地分區及設施都做出了詳盡的規劃。

2017 年底，農村再生計畫的課程即將結束，到了要向政府部門提案的最後階段。但再生班並未結業，村民也沒有提出他們的發展計畫。原來到了後期，社區發展協會內部出現了嚴重嫌隙，總幹事智文是年輕理監事的領袖（以下稱青壯派），卻在行事作風與財務核銷上與不分派系所有長輩都發生爭吵。由於他是村內唯一熟稔社區營造計畫流程的人才，他的退出造成整個作業停擺。隨著 2018 年地方選舉到來，同派系卻已經決裂的理事長麗珠與總幹事智文在鄉代表選舉中競爭，不僅雙雙失利，連帶也拖累盟友村長豪哥落選，敵對派系全面執政，掌握了村長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位置。但新執政團隊對社區營造陌生，也沒有提案能力，於是發展願景離他們更遠了。

山櫻村短暫而多舛的發展歷程，從外部論述所點燃的火種起始，到內部爭吵不休與分裂告終，並不是特殊個案，或許在許多社區都曾上演過。改革有得有失，所以引起保守勢力反撲，也不是新鮮事。不過山櫻村並沒有任何人反對生態觀光的發展理念；計畫尚未推動即夭

折，因此也不是出自任何利益受損者的反撲。山櫻村的衝突難以單純用「利益爭奪」或者「改革者與保守者」框架來理解。換個角度看，「發展」是模式與再現的輸出（並與資源分配緊密相關），山櫻村的失敗凸顯一個外部導入的發展論述，其價值階序所造成的區隔與排除效果和既有派系分歧之間產生複雜、不可測的連鎖反應；更帶領我們深入該村的家族與派系生活、世代間衝突、國家／村落關係、轉變中的價值與秩序，以及考驗凝聚共識並創造更適合在地條件、更具包容性的發展視野之政治能力。

五、山櫻村的家族、地方勢力與政治

山櫻村是日人將筏灣與瑪家兩個聚落群集團遷移的產物，兩部落過去處於敵對狀態（石磊 1969: 224）。在這種情況下要共處並創造一個道德整合的社會，可想十分艱辛。早期兩派相處緊張，壁壘分明，婚喪喜慶與歲時祭儀各自舉行，每逢選舉必定各自歸隊。至今區分仍隱然存在，村民都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系統，但絕大多數人也都認為這種區隔已經式微。

基督教對促進融合產生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兩派頭目之間透過相互協商與禮讓，共同主持儀式性場合，創造了新的象徵秩序。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麗珠說，由於山櫻村位處瑪家系的傳統領域內，筏灣系頭目更有意願主動釋出善意以促進融合：「我們這個筏灣系的頭目，他就是很知道這個禮儀的尊重……這個部落就是我們共同生存的地方，所以我們也一直都這樣灌輸我們的孩子們」。村中的一幅彩繪壁畫上頭畫著兩派選手在比賽中各執一條豬腸的兩端用力吹氣，結果自然是不分勝負。這壁畫一方面述及過去相互競爭的歷史，另一方面也提醒眾人持續團結的事實與需要。

長年互動通婚也很重要。許多人的親屬關係中既有筏灣系，也有瑪家系。以前任村長豪哥為例，他的奶奶是筏灣系、父親是瑪家系、母親是筏灣系與瑪家系混血，所以對他來說「筏灣也 OK，瑪家也

OK」。

另外，在部落被納入國家行政體系之後，傳統頭目實權被削弱與式微，行政官僚權威在世俗事務上取得絕對支配力（譚昌國 2009: 171）；地方自治讓平民從身分階序決定權力的結構中解放出來，同時貴族在選舉中不一定較有優勢（鄭瑋寧 2019: 314）。這些趨勢都讓頭目只剩文化傳承與象徵功能，也有助於兩個系統的社會融合。

在當代山櫻村真正重要的是家族。選舉就是家族人脈與資源的比拚（受訪者：青年會會長大勇）；人多勢眾又有財力的大家族實質壟斷了村內的選舉，歷屆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鄉代表都是出自這些家族（見附錄 2）。

家族是山櫻村政治生活的基本元素，就如國小教師大樹所說，「自己人挺自己人」的鐵律逐漸褪色，但依舊適用。「很多年輕人跟我說，那個 vuvu（排灣族對祖父母的稱呼）叫我投誰。我說你已經長大了，自己知道要投誰。」家族爭奪政治權位，政治人物的選拔甄補透過家族網絡。家族長輩暗中觀察年輕人表現，推出合適的參選人；也在多名成員有意願參選的情況下介入協調，讓最有勝選機會的人出來。但協調失敗的情況所在多有，造成家族票源分散，最後導致兩敗俱傷（受訪者：前鄉代主席鄧伯）。以 2018 年甫卸下發展協會理事長麗珠來說，她是從村外嫁進來的媳婦，曾被婆婆嫌棄平民身分，在村中地位甚低。但是她在教會中表現傑出，被選為會長；儲蓄互助社理事長（麗珠丈夫的表哥）覺得是可造之材，提拔她去儲蓄互助社任會計，最後被夫家遠親鄧伯推出來選鄉代表，第二任又當上副主席。但連任之路在家族多人競爭之下中斷，才轉而擔任發展協會理事長。

家族與家族之間的結盟構成村中主要政治派系。最近幾年已沒有縣級政治人物，最高只到鄉代表。表 1 呈現山櫻村主要兩大一小派系，圖 1 呈現派系人物之間的親屬網絡。

這些派別是選舉時相互競爭的單位，並在自己人施政時協力支援。以 2018 年底選舉為分界，在此之前由豪哥與麗珠分占村長與社

表 1 山櫻村的政治派系

舊當權派（農村再生計畫主要推動者）
前村長豪哥 第 19-20 屆村長（2010-2018）
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麗珠
前總幹事智文
前鄉代表會主席鄧伯
青年會會長大勇
新當權派（守成，無作為，但並不反對各式社區營造計畫）
現村長巴叔 第 17-18 屆村長（2002-2010）、 第 21 屆新任村長（2018-2022）
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耿爺（曾任鄉代表會主席）
村長助理小巴姊
結盟：
現鄉代表會副主席陳再上
現部落會議主席余莓
青壯派（附屬於舊當權派、推動社區營造的一群知識青年，具有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身分）
國小教師大樹
國小教師淑芬
廚師阿茂
退伍軍人政偉
約聘公務員育慈
社工潔恩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智文擔任總幹事的聯盟主導，農村再生計畫於此時期推動，並且青壯派及青年會十分活躍，時常舉辦各種活動，是社區營造的高峰期。但在執政後期，派系因智文與麗珠內鬨而分裂，導致前前任老村長巴叔回鍋選上村長，與耿爺、陳再上等實力人物合組新的執政聯盟。新當權派都是村中老輩人物，守成而無作為，派系屬性及文化習性都與青壯派、青年會領導幹部不合，於是原先活躍於社區事務的年輕人紛紛選擇退出並觀望，山櫻村的社區營造遂進入停頓期。

村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兩個職位經常互相結盟，這至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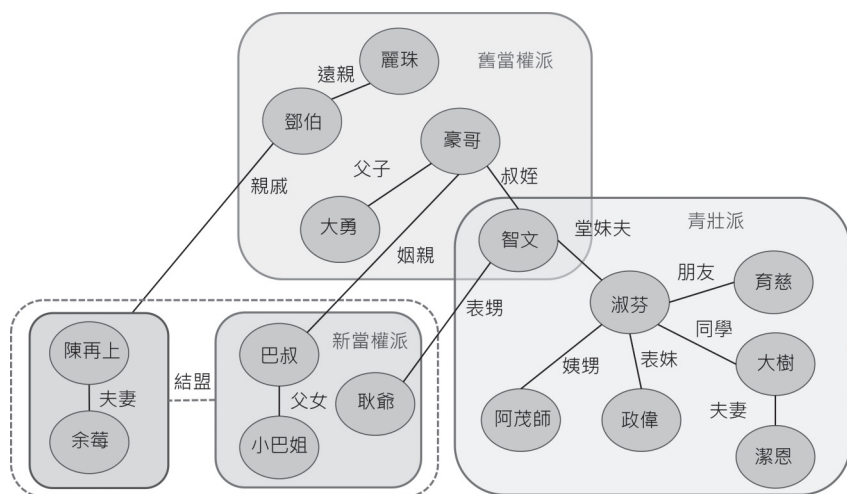


圖 1 派系人物之間的親屬網絡

功能上的考量。前村長豪哥舉鄰村村長才剛廣播完，社區理事長隨即發布另一個廣播否定前面決策為例，說明兩個職位最好是找能合作的人。但村長是派系中更核心的職位。前總幹事智文分析：

選舉會產生村長嘛，那這個「派系」就產生，擁護村長當選的人，他就會去想部落的職位，因為今天我幫你，我也要有好處啊，所以當這個權力起來之後，這些當時幫他的人，都已經做好交換了，所有東西都交換了。當巴叔出線的時候我們就知道，社區發展協會的會計出納要換人了，總幹事要換人了。連鄰長、文化健康站的照服員也換了。

跟政治學討論「地方派系」不同的是，這些派別以親屬網絡為動員基礎，但構成更鬆散，成員自主性更高，界線更為模糊，也不具備名稱。⁷ 隨著每次選舉情勢不同，會有不同結盟對象及條件，關係非

7 根據王金壽（2004: 189）的說法，「名稱」是派系的基本條件，有認定的社會功能，也是動員的基礎。山櫻村的派系雖沒有名稱，但人們都知道誰跟誰是同一派。

常流動多變。⁸ 智文形容這種多變的關係：「它（派系）會很自然形成，想法、利益差不多，共識就會出來，就一股，一圈一圈的人就會出來。」而村民跟派系也沒有持續、忠誠的關係，在不同層次的選舉中，可能支持不同的派系對象，「明明村長和某某代表是比較好的，可是你選這位村長，不一定會選那位代表」（受訪者：國小教師大樹）。

地方政治短暫分聚的一個事例，是 2019 年新當權派上任之後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改選。巴叔結盟政治世家 Laulian 家族中的耆老耿爺（曾任多屆鄉代表及代表會主席），由其競選理事長；而前總幹事智文出馬挑戰（兩人是表甥舅關係），並得到大部分青壯派理監事的支持。但先前舊當權派前理事長麗珠與前總幹事智文內鬥的內傷未癒，部分挺麗珠的青壯派拒投智文，而同派大老鄧伯也在巴叔遊說下轉向，以致智文以一票之差敗給耿爺。

上述事例顯示，山櫻村的政治生態無法用威權體制控制的地方派系來理解，也不具由上而下鮮明的支配結構以及選舉機器特徵，反而相當流動，年輕人有自己的自主想法及政治意識，政治動力的分與合難以預測，傾向不斷重組與衍生新團體。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地方政治勢力與國家之間的接合關係時，情況也是如此。這對地方培養公民社會以及民主運作而言意味著什麼？引入發展論述與競爭體制之後又造成什麼變化？是下面幾節的課題。

8 派系的構成鬆散多變或許跟親屬規則有關。排灣族的親屬團體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暫時團體，對父母雙系親屬一視同仁看待，父子的範圍不同，兄弟也不同，因此不能形成一個永久而固定的親屬團體。石磊（1971: 140）提到筏灣人的認親範圍向上追溯到第五代高祖父母，旁系親屬認到三從兄弟。但是田野報導人告訴我的家族選舉動員的「核心圈」比這小得多，大約往上追溯三代到（外）祖父母，往旁追溯到從（堂、表）兄弟姊妹，外加關係好的姻親。這算是基本盤，成員有義務要出錢出力挺自己的家人。但是在這範圍之外的親屬，如果感情好，也一樣可以納入基本盤。由於親屬支持網絡容易窮盡，在選舉時有時更看重椿腳擴張票源的能力，椿腳就純粹是利益取向的結合。

六、侍從主義、政黨競爭與公民社會

流動多變的地方政治生態，本身即是民主化的產物。在政治環境開放、政黨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以往選舉侍從主義的種種特徵，也逐漸出現質變。最明顯的，就是原住民部落不再只對國民黨效忠，其他政黨也建構各自的人情利益交換網絡。相對於國民黨黨產被凍結導致地方黨部運作式微，⁹民進黨挾著執政豐沛資源在縣長選舉中已可拿到山櫻村四成的選票，大多數是年輕人的票。這意味著，雖然侍從主義式的政治互惠與交換依然隨處可見，但交換的意義與性質已然不同。最主要的，是從層級化的不平等與控制，轉變為平等互惠關係。在民主體制中，由於政治競爭激烈，追隨者可以轉換恩庇主，強化了交換關係中的制衡力量；而當追隨者愈不受操控，侍從主義也愈接近民主的「委託—代理」（principle-agent）關係（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 7; Hicken 2011: 292）。這對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有著重要意義。

山櫻村的地方勢力長期與幾位藍營立委有合作關係。2016 年立委簡東明被控賄選，在 100 多名被起訴的期約賄選樁腳中，就有多名山櫻村地方人士（該案一審簡東明被判 5 年，高雄高分院更一審改判無罪）（鮑建信 2019）。這乍看之下是國民黨依舊在原住民部落維持盤根錯節的支持者網絡的例子，但實際情況更複雜。

幾位地方政治人物的黨籍在國民黨與無黨籍之間變換（耿爺、陳再上與智文都曾如此）。選舉時公開披掛國民黨以外的政黨戰袍仍屬罕見，無黨籍往往是支持其他政黨的掩護，顯示因政治現實需要而轉換陣營，已是家常便飯。豪哥也是一個例子。他是國民黨籍，但在縣長選舉卻是民進黨的樁腳。當他去年村長落選時，縣府某處室副座打

9 據耿爺的說法，瑪家鄉國民黨地方黨部主委甚至必須自掏腰包貼補黨部運作經費；三地門鄉地方黨部因佔用原住民保留地，已經被民進黨籍鄉長收回；而泰武鄉地方黨部也沒有運作。

電話給他，請他報名巡山員招考，會優先錄用（最後卻因為現任村長巴叔沒有通知而錯過報名機會）；而他在公家機關任職的媳婦，想要調到離家近一點的地方上班，國民黨、民進黨籍民代都提出不同方案以供選擇。政黨競爭使追隨者從自身需求的角度衡量恩庇主是否值得支持：

我認為○○也是不錯。你看我當村長時跟他說，這個擋土牆護欄多危險，我們的野溪的這個水，（沖刷得）都很多坑坑洞洞的。你能不能補助一些經費？他就派他的助理來看，大概四百多萬的經費，他義不容辭地就答應啦。那他也是很阿莎力，因為過去我們沒有找過他，所以他的票在山櫻村都沒有超過 50 票。

擔任過幾屆鄉代及代表會主席的鄧伯也說，雖然他們長期都是跟國民黨立委配合，不過近幾年也漸漸有人會找民進黨立委，民進黨籍縣長在選舉造勢場合掀起的熱度，更是「讓我們嚇一跳，因為我的兩個媳婦在原民處，所以我們有去。她們打電話給我說，爸爸你一定要到喔」。鄧伯對這段軼事的評論是：「我們在山上的吼，永遠是支持這個國民黨，但那些年輕人在外面就不一樣。」

不僅投票偏好在年輕世代更開放與理性，追隨者在不同層級的選舉，根據候選人的過往紀錄和作為，有複雜而多面向的考量，¹⁰ 其中有益交換回報的必然，也有從理念或村落整體利益出發的選擇，是對整體情勢做出評估之後發展出來的策略。就如豪哥所說：

（支持對象）沒有所謂的這個漢人或者是什麼原住民，主要是，你的計畫被肯定的話都是 OK 啦。就算你是原住民，我

10 一個粗略觀察是：在村與鄉的層級，親屬與人情關係相當大程度決定投票傾向；在縣長與立委層級，能不能為本村發聲與爭取更多建設是考量重點；到了總統層級則往往是媒體印象決定好惡。

們還是常常罵我們的原民會主委啊，因為你有時候沒有照顧我們原住民啊，反而漢人都比較照顧我們原住民啊。所以我們主要看的是你有沒有在用心，用你的心去真正的在這個部落。

我們沒有所謂的分這個黨派的，因為我從八年前才加入國民黨，我都是以無黨籍的身分吼，隨便，只要是都 OK，但是我所看到的，只要你敢講，敢去跟人家懇託，他一定會，不管是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好，他一定會照你的需求來做一個。¹¹

在此情況下，雖然某些交易帶有私人恩惠性質（如優先錄用巡山員、媳婦調到離家近的上班地點），是公共資源與職位的政治化與私人化；但另一些則很模糊，例如擋土牆、修繕水管農路、社福補助等等，也是特定人群基於身分、權利的正當需求。民主體制下的侍從式關係可以是混合了政治化的資源分配，和以權利、資格論定的普遍性資源分配兩種原則（Fox 2012）。這些交易是否一定以選票支持作為對價條件，也沒有強制性；因為政治人物無法總是能做到排除那些沒有在選票上回饋的人。¹² 儘管如此，政治人物基於政治競爭仍會經營

-
- 11 2020 年立法委員選舉，代表民進黨參選的伍麗華擊敗國民黨提名的章正輝，是一個很好的註腳。豪哥在選前即認為，立委選戰的支持邏輯很清楚：「一定是支持我們屏東自己人，全屏東的原住民一定是支持國民黨推薦的這個○○○啊，但如果（國民黨提名）台東出身的章正輝的話，那我就不曉得了。」理由是屏東原住民鄉要有自己的立委才能替自己發聲，政黨屬性在其次。這個想法在選戰期間普遍發酵，後來印證豪哥所言：國民黨推出台東縣議員章正輝，對上曾任地磨兒國小校長與屏東縣政府原民處長的武麗華。章正輝出身台東的事實被認為未必能以屏東鄉親為優先；而夫家在瑪家鄉佳義村的伍麗華則沒有此顧慮，又有政績做後盾。最後伍為民進黨奪下首席山地原住民立委。媒體普遍認為，傳統國民黨鐵票區的屏東縣原住民鄉在總統與立委選舉上「分裂投票」（在此區韓國瑜得票遠高於蔡英文）是關鍵（羅欣貞 2020）。山櫻村在主要候選人的投票分布為：伍麗華（344 票）、章正輝（179 票）、高金素梅（162 票）。
- 12 這不代表政治人物不會嘗試這樣做，更重要的是，就算做了也不會講。如果行動者對於行為導致懲罰的後果沒有建立起明確預期，懲罰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屏東與縣府關係良好的某部落在此次選舉中原本欲支持伍麗華，但因為部落頭目和章正輝有家族親戚關係，百般為難下最後仍選擇公開挺章，但私下配票給伍。選後縣府承諾幫忙的一件重要事項便停滯下來。這是選後算帳嗎？沒有人知道。但該部落的選擇仍彰顯了自主性。

侍從關係。上述豪哥找那位「票在山櫻村都沒有超過 50 票」的民代幫忙，就凸顯這點。

山櫻村最具進步意義的公民團體，亦即表 1 所稱的青壯派，兼具以下兩種特徵：它誕生於親屬人情網絡，但同時也運用公民社會的權利論述與行動劇碼（repertoire）；既可以是民主體制下賦權（empower）人民的行動者，也可以是穿梭在追隨者與恩庇主之間，連繫起鬆散網絡的捐客（Anciano 2017: 593）。這是一群在平地社會有求學與工作經驗的知識分子，回鄉推動社區營造，並集體進入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理監事。

從表 1 可知，青壯派親屬人際網絡的核心是國小老師淑芬。她在台中工作了十幾年才回鄉教書。青壯派以淑芬的人際網絡向外擴散，¹³ 被她找進來的成員都是具相似背景與理念的親戚朋友，又因為淑芬同時與豪哥與麗珠都是「自己家裡人」，青壯派首先是以村長「行政規劃小組」的名義成立，專門做村長幕僚，無役不與，做出一番成績之後又集體成為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

跟理想中公民團體應該展現獨立自主性不同，青壯派一開始就是黨派色彩鮮明；黨派不僅不是包袱，人脈與資源反而提供了讓事情得以完成的必要權力。另外，他們的成績就是村長的政績，轉化成下次競選時的資本；他們也與豪哥同進退，在巴叔上台後消極抵制新執政團隊。但舉凡各種節慶時的康樂活動與競賽、豐年祭、文史尋根、課輔班、族語振興、對公共議題積極表達意見等等，也確實豐富並促進了山櫻村的公共領域。

另外一個例子是備受外村讚譽的青年會。他們連續三年在鄉公所舉辦的豐年祭中拿到精神錦標總冠軍，在颱風天主動二十四小時待命巡邏、救災滅火、婚喪喜慶無酬幫忙、發揚與創新傳統儀式如獵人團、成年禮等等。這個組織的會長是豪哥的兒子大勇，最初被年輕人

13 總幹事智文除外，他比淑芬更早進入社區發展協會，由於經驗豐富，熟悉計畫撰寫與申請的各項政府流程和細節，儼然是這群人的老大。前文提及智文與麗珠決裂，讓這群人左右為難。其中部分挺麗珠的人在理事長選舉拒投智文，導致後者敗給耿爺。

公推出來擔任會長，理由正是他身為村長兒子的身分「最有說服力，大家會聽你的」。後來靠著他的奇里斯瑪（charisma）型領袖魅力，成員從個位數成長到九十多人，會長改選從來不是議題。大勇不諱言會務運作帶有執行村長意志的色彩，「你爸爸叫你做什麼，你不能反抗說，我憑什麼聽你的話，不可能嘛」，但也是一個可以容許民主討論，¹⁴有獨立目標的組織。他們的目標是：「像台東的那個撒可努創辦獵人學校一樣，文化可以自己做，因為都要更新啊。」

若我們拘泥於公民社會的規範論述，很可能會忽視這些團體帶來的改變與成就，甚至貶為黨派工具。另一方面，這些在台灣鄉村經常可見的團體也面臨質疑：它們改變舊派系習性並引進新價值、新想像的能力有限，並不能真正翻新「為公而行」的意義（楊弘任 2014: 205）。事實上，團體具有派系屬性一事，未必妨礙公共性建構與公共領域的擴大。

豪哥在村長選舉敗北，青年會立即面對如何與新執政團隊相處的難題。「青年會有什麼用，最後還不是輸」的風涼話傳出，惹得他們很不是滋味。部分出於選舉恩怨、部分認為新執政團隊在籌備過程中不夠用心，青年會成員在豐年祭與鄉運舉行時一反過往積極參與的態度，流連於釣蝦場、卡拉 OK 或跑去烤肉，讓場面冷清難堪不已。結果會長大勇反而被自己的姑姑責備：「你們不能這樣子，你們不能針對人，要針對事情。」大勇自己也坦承，他很討厭「選舉過後，大家的心態都變了，以前很好，選完就有點疙瘩和距離」。大勇認為年輕一輩雖然也會受派系競爭影響，但他自認跟老一輩不同：

幾乎都不想去干涉，政治是政治，關我們什麼事？幾乎年輕人都這樣子……還是會有些表弟孤立我們，¹⁵因為他們贏，

14 這當然是有限的民主。青年會的討論通常透過網路群組進行，20 歲以下青年有自己的群組，為的是鼓勵他們不受年長者權威的干擾，能暢所欲言。大勇的職業是建築業綁鐵工頭，綁鐵也是村內最多年輕人從事的職業。這些網路群組也兼作工班發布工作訊息，招募工人之用。

15 豪哥與現任村長巴叔是姻親，巴叔再娶的妻子是大勇的伯母。

我們輸嘛，他們反而會不好意思理我們，贏家不好意思理我們。

有些年輕人會說，你們青年會（是派系）。我問他們是不是山櫻村的？既然是，就算是青年會的人……我們不是誰誰誰的青年會，是掛山櫻村青年會……青年會一起做，不管你是誰，像之前這裡有發生一場大火，半夜三點被叫起來，我過去，有四十幾個年輕人在那邊救火。

Scott (1972: 94-95) 認為，侍從關係仍須受到角色期待等社群規範價值的支持與約束。大勇姑姑的責備意味著，派系競爭行為若超出村落對「公共性」的規範與期待，是會受到輿論譴責的。楊弘任 (2014:51) 在其細緻豐富的民族誌中也呈現了這一點，雖然並未特意強調。例如林邊鄉民對於「鄉長」一職重視聲望，傳統上由醫師、老師等地方仕紳出任，舊派核心人物阿財說：「鄉長是要選來做名聲的，不可以拿來求利益……農會才是選來拚實力，做人情。」另外，舊派珍珠一村村長阿心「做社區」卻被鄉公所政風單位調查，化解之道是找鄉長之妻的舅舅與有交情的外鄉鎮縣議員調解，說明「這些工作是為了社區，為了公的」，抵制情況才逐漸好轉（楊弘任 2014: 73-74）。這些例子都顯示，即便是派系也服膺某種公共性規範。

這些關於公共性的觀念或規範也可以透過派系之間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維繫並擴大。在難堪冷清的豐年祭與鄉運結束後，豪哥與巴叔兩個陣營都有人穿梭連繫，試圖重建對村落共同體的共識與認同。有意思的是，兩邊搭橋的角色都是由女人擔任。雖然青壯派全部退出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但淑芬仍透過參與婦女會得知發展協會正在做的事情，並且跟巴叔的女兒小巴姊有好交情。淑芬也不顧豪哥反對，仍去幫忙豐年祭的籌備張羅，甚至也去勸說大勇：「部落的事，不管是誰（主持），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們就要出來。」

選後青年會會務幾乎停擺，形同解散。這是因為大勇認為，改朝

換代後，新任者若沒有出面請託或要求，青年會不宜積極運作，「怕人家說我們另有企圖，要搶新村長的風采」。¹⁶ 原本他不預期新團隊會提出幫忙要求；然而青年會若是不動，隨著今年豐年祭即將到來，可能重演去年的冷清場面。沒想到是小巴姊主動拜訪，甚至在她牽線勸說下，連巴叔和耿爺這種耆老級的長輩都登門見豪哥、大勇父子，表達「村子真的沒有年輕人不行」的心意。

於是，大和解的氣氛形成了。大勇在臉書傳達動員令：「是我們青年會該出來幫忙的時候了（有沒有聽到）。」底下回覆一堆「讚」及「收到」；而巴叔的兒子也上來留言：「哥哥我不好意思過去你們那裡，希望哥哥可以帶動我們大家讓山櫻更好。」大勇回覆了一個比起大拇指的貼圖。今年豐年祭比往年更熱鬧。

登門請託是一種彼此再次承認對方「作為道德社群共同成員一分子」的儀式；藉此儀式，對手陣營承認豪哥父子是跟他們一樣對村落共同體有貢獻且值得尊敬的夥伴，修補因選舉而產生的共同體裂痕。根據 Somers（2008: 6-7）源自黑格爾的觀點，公民權（citizenship）的基礎是「承認」對方共屬於一個道德社群且被「社會納入」（social inclusion）。於是透過和解儀式，山櫻村作為大家休戚與共的「公民社會」再次重獲新生。

承認政治也是李丁讚（2004b）所說「親密關係」的建立，因為承認的是具體且獨特個人在社群中的地位，而不僅是這個人的公共角色。只是此處的親密關係，並非「認真而細緻地去聆聽和凝視對方」（李丁讚 2004b: 392），而是「同屬一個社群的可敬夥伴」。當然，承認儀式不能排除是出於私利的考量而舉行（例如連續兩年冷清的豐年祭對巴叔而言將是災難），也不會消弭派系競爭；但透過相互承認對方對於社群的辛勞與貢獻，社群感與公共責任可能被激發，派系範疇可能被超越。重要的是，這股超越的潛力是一個派系社會原本就蘊

16 這是派系邏輯的考量。

藏並與之共生的。¹⁷

不過，最近幾年山櫻村內部最嚴重的衝突，反而不是來自這種跟選舉有關的傳統派系摩擦，而是現代知識技術權力與傳統部落族長控制慾之間的齟齬。衝突從原本可協調性質轉為兩不相讓的是非對錯問題，並對原本活潑的山櫻村公民社會投下一道長長的陰影。這就回到本文第三節提到農村再生計畫半途而廢，肇因於前總幹事智文跟不分派系所有長輩衝突的往事。後發展研究指出，「發展」是國家將現代性的思維模式與經驗向地方灌輸的結果（Escobar 1995），不過與其說這是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的治理秩序，不如說是透過地方政治場域，由國家、中介者與地方社會三方互動出來的結果。

七、治理性、新自由主義與發展體制

社區總體營造作為發展體制，是一種治理人口、增進生產力及福祉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治理（government）意謂著對有自由意志與承擔後果能力的主體之行為施加另一個行為（conduct of conduct）（Gordon 1991: 2），意在規範、引導、模塑、矯正；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即是透過個人或社團的自我管理來遂行的「遠距統治」（govern “at a distance”）（Rose and Miller 1992）。在新自由主義階段，社區營造不再是國家由上而下推動發展計畫與進行資源分配，反而強調分權化、公私夥伴關係，以推動居民民主參與，凝聚社區意識，營建社區文化特色（陳郁秀 2001）。簡言之，是「引進當代公民社會的信任互惠原則來建立社區經濟」（陳東升 2017:

17 楊弘任（2014: 61-63）敘述林邊文史工作室如何突破派系習性，成功舉辦「花現林邊蓮霧節」的過程，足以對照。首先是透過人際網絡說動農會理事長支持；其次是蓮霧技術訪談所整理出來的「蓮霧小百科」取得師傅們的認同；但仍不足以化解「這是為派系」的質疑。最後臨門一腳是曹老師出面，在派系要角開的餐廳邀請所有產銷班長及農會相關幹部，反覆強調該活動將由鄉公所與農會掛名主辦，一切「都是為了公的」，給派系做足面子，分享功勞，重建「為了庄頭」的相互信任。楊弘任強調的是改革者如何運用策略扭轉派系習性，但那場確認「一切為公、分享功勞」的承認儀式並不是知識分子改革者自創，而是依循派系社會既有的文化規則。如果不是派系競爭仍須在某種公共性的規範理想下進行，那麼改革者的策略也將無效。

590)。

於是，社區發展成敗的責任，某種程度上就由國家轉移到社區自身。此一傾向更由於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執行採用「競爭型計畫」模式而得到進一步強化。根據朱鎮明（2010: 74），所謂「競爭型計畫」意指：「針對中央所提附經費的政策或計畫，由有意願的執行者經過一定程序而提出計畫書，經過公開的專業評選過程，擇優進行差別性補助，並由獲補助者執行政策或計畫。」其效果是各社區之間相互提案競爭，並區分為優勝者與淘汰者；優勝者同時也被認定是一個公民社會發達的社區。既然一個社區的公民意識及社會連帶之培養只能從該社區內部著手，那麼，優勝劣敗就該由社區自負其責，與國家無涉。

然而，從地方的角度來看，想要參與發展體制的競賽並不容易，預設了高門檻的現代化能力。首先是熟稔經費申請程序，能夠寫計畫、提計畫的能力；其次是用公民社會的論述與組織模式和他人溝通並設定集體行動的能力。在村內，掌握現代理性溝通與官僚組織知識的青壯世代，透過參與社造的補助競賽，獲得了新形態的科技權力挑戰傳統權威，造成了山櫻村的內部分裂。¹⁸

智文經常抱怨，山櫻村除了他之外，沒有其他幹部有寫計畫、提計畫的能力。不僅如此，由於政府各部會如教育部、文化部、農委會、勞動部、農委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等等都有類似經費可以申請，申請人需要很清楚各單位公開徵件的時間、資格與條件以及用途限定為何，才能將資源做一串聯。要有這些資訊，就須勤於參加公部門辦的各種講習課程。對智文而言，村中長輩沒有這種積極主動性，只有想法，沒有執行力。於是，只好他自己一個人悶著頭做。這導致社區發展協會在大多數時候只能走傳統路線，譬如辦綠美化活動、文

18 關於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塑造的主體化效應，以及多重、分裂的自我，參見黃應貴、鄭瑋寧（2017），鄭瑋寧（2017, 2019）。但本文以下田野經驗所揭示者稍有不同：新自由主義主體化的過程在村中並非暢行無阻，它一方面被熱烈擁抱，另一方面也遭到質疑與厭惡。

化尋根、清寒補助、老人關懷、豐收祭、社區巡守等等。但智文認為，社區營造才是山櫻村未來應該走的道路。

長輩也同樣抱怨。我訪談過的不分派系長輩都說法一致，認為智文經常申請計畫都不跟理事長和理監事商量，就自作主張去做。更為嚴重的嫌隙在於經費使用方式。智文所申請的課輔班經費，有八成是專款專用在計畫所聘的專案管理人員身上。但不熟悉計畫運作方式的長輩卻不明白「專款專用」的意涵，認為進來社區的錢就應該是大家共同分配，也質疑專管人員又不是老師，不應領這麼多薪水，卻忽略了專管人員必須負責執行計畫的所有行政業務。

智文持續與其他質疑他、想要改變他做事方式的人衝突，最後智文的表舅、新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耿爺到警察局控告智文偽造文書。這在重視親屬關係的山櫻村，可說是聞所未聞的大事。控訴最後不成案，但大家都知道是因為智文忤逆了人際關係中的禮節與輩分，導致了荒謬的結果。家族大老鄧伯說：「你再怎麼聰明，在我們原住民，如果你背向家族，我們很少接納這種人。一定要用把我們像自己家裡人一樣對待的那種人。」

在不斷衝突之後，智文另立協會，路走得愈發孤獨；社區發展協會也失去了一個難得的人才。接替智文擔任發展協會總幹事的國小老師大樹，帶著對雙方的同理理解來評論：

智文其實滿多阻力的，剛開始的時候，他比較不能讓年長理、監事了解他的想法……以致於他們在接收溝通上面就出現一些……會有一些小差距，沒有辦法接收到他的用意。老一輩的就會對他產生一些質疑。

他有點操之過急。我覺得老人家其實可以慢慢地了解，他們可以接受，只是重點是我們怎麼讓他們接受，然後我們的想法怎麼很清楚地讓他們知道……。

智文與村中傳統權威的衝突，其實並非特例，反映當代原住民

青年回部落服務時廣泛面臨的挑戰；這挑戰跟發展體制的競賽規則墊高了溝通成本有關。例如，鄰村社區發展協會前總幹事告訴我，她接任幹部後經歷了一段痛苦的適應期，原因在於她其實是在平地念書長大，在返鄉服務前只有週末往返部落小住。這使得她不清楚部落長輩在生活與文化層面的規矩與堅持。例如不可以直接開會丟出計畫與想法，老人家會以為妳已經想好了、決定了才告訴他；必須先開「會前會」溝通演練，也要開「會後會」聆聽長輩分享與補充叮嚀。她說：「時代變化太快，光是『計畫』，我們就沒有這個單字。那我們要怎樣讓老人家了解我們要做什麼？」提出此一反思隱含著，要看見並細緻處理脫韁公民社會中的種種差異所帶來的溝通挑戰，抗拒用現代／傳統、進步／落伍的二分法來詮釋爭議。

另一個新自由主義治理性在原住民部落引起的衝突，是社造的產業化導致「族群商品化」，與原住民運動標舉族群「本真性」（authenticity）將原鄉部落視為文化和生命力泉源的趨勢，既相合又衝突（黃應貴 2018: 3-4；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9: 12-16）。族群文化的商品化被視為培力的工具，但在內部資源分配不均以及破壞文化意義與歸屬感之下，又成為部落內部紛爭的火藥庫。我們可以以此理解屏東幾個文化復振與文化產業都有強烈需求的部落的內在衝突。但山櫻村在「族群商品化」上停滯不前，也就避開了此一發展陷阱。

然而，從結構的角度來看，上述兩種衝突恐怕無法依靠善意溝通與互諒即能避免。當國家不僅透過經費預算來引導社區發展的方向（呂欣怡 2001），同時也讓社區相互競爭提案、自負成敗責任，以作為治理地方的技術時，就已種下紛爭種子；但國家彷彿置身事外。另外，當外部引入的流行發展論述預設了一定程度門檻的知識形式、權力體系和主體經驗時，就必然在人群中造成差別與優劣，將某些傳統實踐與經驗貶為落伍和阻礙發展，此時已埋下紛爭的種子；但發展論述及其慾望卻彷彿無關，毋需被檢視。¹⁹ 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山櫻

19 一個可資對照的案例，是丹麥社會學家 Sampson (1996) 曾於 1990 年代東歐民主

村的生態觀光之夢，牽涉到國家對土地的強制處分，外部引入流行發展論述在理想與實際之間的落差就更加凸顯，這對愈邊緣的社區愈是如此。

八、不發展，能做什麼？

山櫻村生態步道觀光計畫的推動者是由豪哥領軍的舊當權派，當初得到了跨派系的支持。耿爺與巴叔結合的保守聯盟雖然取而代之，卻未提出不同的發展路線。若說發展主義在山櫻村得到壓倒性支持也不為過。另一方面，智文與村中長輩的衝突也是跨派系的，主要表現為世代之間對於現代性技術知識銘刻在身體實作上的深淺差異，而這些差異會帶來金錢、機會與權力。步道觀光計畫在醞釀期就觸礁，反而給另類發展帶來一線希望。

邊緣社區對發展主義缺乏抵抗力毋寧是正常現象。即便在有進步文史工作者進駐的社區，另類觀點要改造既有的家園想像也十分困難（何明修 2010）。這讓研究者很難在邊緣社區發現另類發展的支持基礎，於是，二元對立思維將邊緣社區刻畫為傳統、落伍、侍從主義橫行的簡單解釋，由於具有清晰易懂的優點，始終不乏信徒。

然而，Gibson-Graham（2006）的架構區分發展論述要人們看到的單一現實，以及實際上透過各種實作呈現的經濟多樣性。以實存多樣性以及無法被發展論述固定的游移和壓抑的主體慾望為基礎，一個另類發展模式可以在四個方向上拓展與深化：看見多樣的社會經濟需

化浪潮期間，協助丹麥政府評估如何運用贊助資金，扶植阿爾巴尼亞的非政府組織（NGO），以促進該國的公民社會。他觀察到，阿爾巴尼亞 NGO 在外觀上愈像西方模式、愈會流利使用英語、愈能熟練計畫專有名詞並操弄象徵與再現資源，就愈能得到西方顧問青睞；傳統、封閉、沒有知名度的組織則被排除。公民社會轉型變成一項產業，文化技巧分配非常不均，是否接觸訊息，以及能否熟練運用公民社會的相關概念與知識，決定了能否獲得補助。在台灣，社造評比也偏好、揀選、獎勵某些操作專有名詞或展示美學體驗的能力，例如呂欣怡（2009: 24）提到學習如何「從台北人的眼光看內灣」，展現內灣「到處都是寶」的劇場能力。這形塑了居民的主體經驗，對這些能力與美學標準趨之若鶩，從而忽略社區真正切身的議題；而社造競賽失敗的社區往往被歸因為缺乏公民社會特質，又等同於不會操作專有名詞與展示美學體驗。

要、剩餘價值歸社區居民共享、擴大集體消費促進團結、擴大公共財（Gibson-Graham 2006: 167-169；陳東升 2017: 581）。

邊緣社區雖然普遍接受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但並不表示居民不珍視自己的經濟多樣性。多樣的經濟社會需求，以及各種互助的、實作的安排與單一的發展意識形態，形成強烈對比且矛盾共存，這正是山櫻村的情況。只有當邊緣社區被吸入發展體制的軌道之內，並誘之以想像的或真實的利益，尤其當少數人嘗到甜頭致富之後，這些多樣的經濟需要及活動才加速被摧毀。從此觀點看，邊緣社區的另類發展潛力反而因無法在發展體制內成功而得以更好地保存。人們或許會珍視這些傳統實作，但不會意識到可以構成另類發展的願景和目標。

青壯派既熟悉發展體制的語言，又代表村民的利益；既精熟行政管理程序，又是村落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介於之間」的青壯輩，既是發展意識形態進入村落的在地協力者，也是另類經濟的提案者。²⁰

我曾經請每位青壯派成員談談他們的發展願景及行動方案。每個人在訴說的最後都會連繫到失敗的步道觀光計畫，彷彿該方案是安置所有行動創意，並能保證其成功的終極架構。但實際上他們關懷與行動的多面向遠遠超出了觀光計畫。例如，大勇找回殺豬文化和勇士舞，想要進一步復振傳統文化祭儀；阿茂想要保存國寶級鼻笛製作工藝，並開一家部落廚房；大樹傾心於推動族語教育；淑芬關心老人失智問題，並細緻地穿梭在世代與派系之間做溝通緩衝的橋梁；政偉將營長退伍的終身俸投入種植高價值有機蔬菜，並把利潤全部分享給請來幫忙的長輩。阿德最初因為不捨岳母田間工作太操勞而一頭栽進農事，逐漸關注土壤與環境問題，也協助其他長輩耕作與銷售。這些行動都超越了「利潤」、「競爭力」、「文化觀光」、「創新創業」等用以組織敘事的構框（framing），回應一個道德社區的互助義務與倫理召喚的需要。如果經過培養與擴大，適足以成為另類發展的基

20 感謝一位審查人的評論提醒我思考及回應此一重要問題。

礎。

正是透過阿德，我窺見了山櫻村還有一個不為人所知的另類經濟世界。相對於紅藜產業化的失敗，看似已經瀕臨凋零、沒有前途的維生農業，在乏人關注之下，卻出現可喜的延續及驚人韌性（resilience），並具有多重社會、文化與經濟意涵。

山櫻村的維生農都在七八十歲以上。近年來陸續有較年輕的人力投入農業，跟排灣族的社會階層制度與長系繼嗣原則有關。在排灣族，貴族的身分特徵即是擁有土地，而長子或長女繼承家屋與土地，有責任維持土地與作物的繁榮昌盛，在文化上象徵著家族的繁榮昌盛。因此，社會組織的自我再生產，同時也維繫著持續有人投入農業，但已從維生轉變為休閒嗜好（受訪者：小農阿德、何耆老）。

這些年約 50 歲上下、積極投入農業的村民，具有以下特徵：一、都是長子／女、年輕時都從事別種行業，中年退休後才改行務農。二、務農的動機都是繼承家業，不能讓祖先傳下來的農地荒廢，以及喜愛親近自然，農業收入只是補充性收入，可有可無。三、他們年輕時對於務農即有所準備，也期待長子／女未來能接棒。四、他們從小就在父母身邊觀看或幫助農事，以身體實作建立了務農的默會知識，現在也如此培育子女。

他們選擇種植的作物是小米、紅藜、地瓜、芋頭、花生、高粱等傳統食物。由於小米在各種儀式、慶典，甚至選舉場合，都需要使用；而傳統美食如奇拿富、阿稗仍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故這些雜糧作物在村內形成一個從生產到消費、流通自成循環的內部體系，非常具有韌性。另外，他們種植的人力組織，體現了禮物經濟及傳統共耕規範；而對於耕種的知識，則體現傳統文化的在地知識，有類似里山的生態循環及平衡概念，因此具有多重而豐富的意義（受訪者：江長老及其父母）。

九、結論

山櫻村沒有外來進步團隊的協助，在政府社造競賽中是永遠的輸家；社區很難找得到能夠產業化的項目，家族仍然對個人抉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派系與侍從關係是日常生活常見的風景。這樣的發展經驗若是能給其他社區帶來什麼啟示，那是因為它其實是台灣偏遠鄉村的典型。

「偏遠」同時亦是「偏離中心」。在這個範疇底下涵蓋的種種政治社會特徵，難道真的是「低度發展」的同義詞嗎？本文從這個「後發展主義」的提問起始，將「發展」視為一個再現與論述的建構過程，並且發現它的效力其實是透過幾個不同領域相互嵌合的論述叢結支撐起來：經濟上，透過農村再生計畫以及生態旅遊概念，推行一套制式化、標準化的課程與方法，以負面表列再現社區為產業、技術與資本的匱乏，最後導向依賴外部協助的產業化、觀光化目標。在政治上，透過公民社會／侍從主義二分框架（並分別被公民社會論述與政治學侍從主義研究所預設），社區亦被再現為公民社會的負面表列。恩庇侍從關係被認為是地方政治腐敗尋租的根源，造成社區凋敝停滯；唯有公民團體才能帶來創新提案，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政治與經濟的兩種負面表列相互支撐，合理解釋為何邊緣社區在社造的競賽遊戲中被淘汰，問題出在社區的雙重匱乏，也正當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治理策略。當行動者接受了這套「論述、想像和心態」，就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處於「低度發展」的羞恥狀態；這也是一個具暴力效果的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

但是田野調查顯示，山櫻村的侍從政治在近幾年有極大轉變，民主化與政黨競爭的陽光已照進這個一度是國民黨牢牢掌控的村落。失去黨產挹注的國民黨地方黨部在選舉中的控制力愈來愈弱，其他政黨爭相拉攏村民，這導致地方派系結盟關係更加流動多變，也更在乎選民的需求與利益。這提升了地方政治的品質，侍從主義轉型朝向有

利於民眾監督問責、賦權、伸張公民權利的方向發展（Benit-Gbaffou 2011; Dawson 2014）；看起來也許仍不夠符合民主理想，但這是弱勢民眾可及又有效的政治策略。

這股政治上的解放力量，同樣也催生了活潑的公民團體。青壯派與青年會雖然依附於村長權威及派系運作之下，在組織形式上不符合西方模式所要求的獨立自主性，但它們的作為實質擴大了山櫻村民的公共參與。更重要的是，派系運作鑲嵌在社群規範價值及村落集體認同的觀念之上，使得派系社會在適當條件配合下有自我超越的可能。

公民團體的改革慾望則受到外來「進步」發展理念的吸引，進入社造的競賽遊戲當中。參與發展體制的競賽需要掌握申請計畫的行政程序以及文書表達能力；在更開放與強調主體性的村落政治氣氛中，無異賦予智文新的知識權威對抗部落族長的控制權。在這個意義上，發展體制「揀選」合格者，展演並打造現實，卻又製造分裂村落的非預期後果，導致山櫻村的發展夢受挫。

公民社會／侍從主義二分的區隔、排除效應造成另一些不平衡發展。首先，地方自治被認為就是派系統治、黑金溫床、行政效率低落及財政不當支出；在既定觀感下，政治人物提出廢除鄉、鎮、市級地方自治選舉，改為官派（丘采薇等 2020）。其次，人們追逐時髦的發展理念與潮流，對改革傳統、枯燥卻攸關村民福祉的地方行政興趣缺缺。青壯派成員育慈即為一例。她是鄉公所社會課的約聘人員，主要業務之一是負責村民急難救助申請。這項業務是專為了那些不符申請低收入戶津貼資格、卻在傷病和失業時亟需拉一把的人而設，採一次性給付，是典型的殘補式福利。育慈的工作即為運用她對各家狀況的在地知識，實質審核哪些人符合撥款的資格。我問育慈，政府的措施是否能滿足村民所需？育慈的回答是：「我們認為有就好了，都可以接受，政府已經幫滿多了。」但身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她卻對社造有更大熱情，不斷追求進步空間：她的發展願景是結合部落藝術人才做鐵雕藝術與街道造景等，讓更多人知道山櫻村；並希望透過更多

創新計畫拿更多的資源進來。²¹ 最後，投注精力到社造競賽中，也就像 Burawoy (1982) 描述美國芝加哥機械廠工人投入趕工競賽一樣，製造了同意 (consent)，遮掩國家在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殖民暴力。

政府財政分配也不平衡。中央統籌分配款分到瑪家鄉公所每年約八千萬元，但其中將近七千萬元是人事費用，只剩下一千萬元做地方建設 (受訪者：耿爺)。這樣規模的經費無法配合地方發展所需，只能鋪馬路、通水溝；甚且在經費拮据之下必須分段逐次完成。耿爺說，他做鄉代表二十多年來，從沒看過能夠一次把馬路鋪好；永遠縫縫補補。而山櫻村主要公共建築如村辦公處、風雨球場、國小等，都已有三十年以上歷史，年久失修。耿爺說：「如果要有大一點的建設，就是要寫計畫申請」，「不然就得靠民代去請託幫忙，我們比較弱勢，誰跟誰的關係比較好，可能就分得到糖吃。」

有人或許會質疑，本文是否過度強調霸權論述對地方的穿透制約，有紮稻草人打的嫌疑？若撇開此一強調不論，本文跟其他從社區內在自發動力來概念化另類發展的社區研究有何差別？我想最大的差別在於案例選擇，亦即絕大多數研究都討論成功案例，而本文討論失敗案例。愈是成功的另類發展案例 (如洪廣冀、林俊強 [2004] 討論司馬庫斯)，霸權論述的制約就愈被克服或壓制，因而愈看不見 (而非不存在)，此時社區內在特徵愈會被事後再現為促成另類發展的正面要素。至於失敗案例由於缺乏動能、嚴重衝突或曾抗拒較好的改革提案，容易讓人產生「任何改變都不可能」的喟嘆，「失敗」也同樣極容易與內在特徵連結，而非指向霸權論述的認識暴力。換言之，對成功案例的過度偏重，不容易看見霸權論述的作用，亦蘊含了對失敗案例的特定態度。因此失敗案例需要被獨立出來探討，以抗拒霸權論述「譴責受害者」的本質化思維，並仍堅持從社區內在元素中看見另類發展的資源。

21 感謝一位審查人指出，因果也有可能是倒過來的：在政府透過社區營造使社區相互競爭經費，來遂行新自由主義式的治理之下，社區居民追逐流行的「地方創生」其實只是因為比較容易取得經費。

作為另類發展策略，即是要正面表列被霸權論述排除、壓抑的脫韁經驗，包括但不限於傳統農耕實踐，地方財政與地方行政，生產、消費與分配的多樣經濟社會安排，破除公民社會／侍從主義的二元認識框架等等，看見回應現實需要的行動力，並使之轉化為「對抗性公共領域」的素材。看見這些資源與強項，就是回到以在地生活為本的關係網絡，建立更多連結與協作，邁向共好共善的目標。

誌謝：本研究是在農委會委託中央研究院執行之「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支持下進行資料蒐集。筆者身為該計畫南部區域中心（設置於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的一員，感謝總計畫主持人王明珂院士的督促，中研院社會所師長們的交流討論，南區中心其他成員以及助理陸韻淳的砥礪支援；並承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109-2410-H-153-002 號資助。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9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以及 2019、2020 年屏東學暨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感謝吳宗昇、錢克綱、鄭瑋寧的寶貴建議；也感謝鄭瑋寧邀約至中研院民族所「比較南島研究群」報告，以及在場諸位先進的評論。研究助理李恆愛給予關鍵而不可或缺的協助。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讓本文以更清晰周延的面貌呈現；編委會對於原住民土地制度沿革的提醒尤為重要，及時彌補了重要疏漏，在此一併感謝。最後，謹以此文紀念總計畫共同主持人林富士先生，他令人動容的堅持與熱情應是農村調查計畫持續運作的最大動力。

附錄 1 訪談對象一覽表

化名	職位	派系／親屬關係
麗珠	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任兩屆鄉代	巴叔姪女 鄧伯遠親 舊當權派
豪哥	建築工、前村長	與巴叔為姻親 智文的叔叔 舊當權派
鄧伯	退伍軍人、前鄉代會主席	麗珠遠親 與陳再上為表兄弟 與舊當權派結盟
大勇	建築工、青年會會長	豪哥之子 與舊當權派結盟
巴叔	現任村長，在豪哥之前任兩屆村長與部落會議主席	新當權派
小巴姊	早餐店老闆娘，經常代理村長	巴叔之女 新當權派
耿爺	警察退休，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任多年鄉代、代表會主席	智文的表舅 新當權派
陳再上	現鄉代表會副主席	與鄧伯為表兄弟 與新當權派結盟，但較不涉入村內政治
余莓	土地代書、部落會議主席	陳再上之妻
智文	退伍軍人、前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青壯派精神領袖
大樹	國小教師、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青壯派
淑芬	國小教師、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青壯派
阿茂	廚師、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青壯派
政偉	退伍軍人、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青壯派
育慈	鄉公所約聘人員、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青壯派
潔恩	社工	大樹之妻
何耆老	曾任護士、社工，已退休；長女繼承家產，現為農夫	鄧伯的小姨
阿德	專業調音師、業餘從事傳統農作	何耆老之婿
江長老	教會長老；長女繼承家產，現為農夫	育慈之母
A	退伍軍人，曾任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副主任	麗珠之夫
B	八十餘歲老農	江長老之父
C	八十餘歲老農	江長老之母
D	長老教會牧師	

化名	職位	派系／親屬關係
E	筏灣系頭目家族成員一	
F	筏灣系頭目家族成員二	
G	鄰村大頭目	與筏灣系頭目同一家系
H	鄰村發展協會前總幹事	魯凱族

附錄 2 山櫻村的主要家族勢力

Vavulengan 家族（瑪家頭目） • 未曾參與選舉
Valiyus 家族（筏灣頭目） • 未曾參與選舉
Dulabalas 家族（筏灣系） • 前任村長豪哥（連任二屆） • 出過四屆村長
Samuravan 家族 + Qerudju 家族（筏灣系） • 現任村長巴叔（在豪哥之前，即擔任過二屆村長、二屆部落會議主席；2018 年選舉擊敗豪哥，回鍋成為現任村長） • 兩家族為姻親關係，勢力龐大
Laulian 家族（瑪家派） • 早期就對政治活動熱絡 • 山櫻村第一個出縣議員的家族 • 現任鄉代會副主席陳再上及其太太余莓（部落會議主席） • 現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耿爺（曾任鄉代表及代表會主席） • 前發展協會總幹事智文出身於此家族的分支
Kumelja 家族 + Tauqayu 家族（筏灣系） • 兩家族為姻親關係 • 前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麗珠（同時亦曾擔任兩屆鄉代表）

註：僅列出近二十年活躍於地方政治的家族，不包括活躍於更早期、但後來淡出的家族。

參考文獻

- 丁仁方，1999，〈統合化、半侍從結構、與台灣地方派系的轉型〉。《政治科學論叢》10: 59-82。
- 丁仁方、趙卿惠、李依霖，2018，〈民進黨地方侍從體制與台灣基層民主轉型：台南經驗的啟示〉。《台灣民主季刊》15(1): 45-78。
-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7: 177-207。
- 王金壽、翁立紘，2019，〈追求地方政治研究的新典範〉。《台灣民主季刊》16: 127-140。
- 石磊，1964，〈屏東縣瑪家鄉筏灣村排灣族的家庭制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8: 89-112。
- ，1966，〈筏灣村排灣族的豐收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1: 131-156。
- ，1969，〈筏灣村排灣族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8: 199-230。
- ，1971，〈筏灣村排灣族的農業經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1: 135-174。
- 丘采薇、林麗玉、鄭嫻、賴于榛，2020，〈綠委提修法，盼 2022 鄉鎮市長改官派〉。聯合報，3 月 9 日。
- 江大樹、張力亞，2008，〈社區營造中組織信任的機制建構：以桃米生態村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6(1): 87-142。
- 朱鎮明，2010，〈競爭型計畫與台灣府際夥伴關係的實踐〉。《公共行政學報》37: 71-110。
- 李丁讚，2004a，〈導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頁 1-62，收入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2004b，〈公共領域中的親密關係：對新港和大溪兩個造街個案的探討〉。頁 357-395，收入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 119-163。
- 呂欣怡，2001，〈地方性的建構與轉化〉。《文化研究月報》第 6 期。
- ，2009，〈觀光產業與地方性形構：以橫山鄉內灣地區為例〉。《客家研

- 究》3(2): 1-48。
- 何明修，2010，〈誰的家園、哪一種願景？：發展主義陰影下的社區運動〉。
《台灣民主季刊》7(1): 1-30。
- 林文源，2014，《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洪廣冀、林俊強，2004，〈觀光地景、部落與家：從新竹司馬庫斯部落的觀光發展探討文化與共享資源的管理〉。《地理學報》37: 51-97。
- 容邵武，2013，〈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台灣社會學刊》53: 55-102。
- 陳郁秀，2001，〈迎接社區總體營造新紀元：創造文化生活新故鄉〉。頁 11-14，收入文建會編，《社區總體營造年會成果彙編》。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陳東升，2017，〈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灣的經驗〉。頁 572-605，收入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張瑋琦，2011，〈幽微的抵抗：馬太鞍原住民食物系統的變遷〉。《台灣人類學刊》9(1): 99-146。
- 梁炳琨、張長義，2005，〈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為例〉。《地理學報》39: 31-51。
- 黃應貴，2018，〈導論：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頁 1-58，收入黃應貴主編，《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台北：群學。
- 黃應貴、鄭瑋寧，2017，〈導論：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頁 1-74，收入黃應貴、鄭瑋寧主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台北：群學。
- 湯志傑，2006，〈期待內在批判的璀璨未來：評《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思想》2: 181-207。
- 湯京平、呂嘉泓，2002，〈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從山美與里佳經驗談社區自治與「共享性資源」的管理〉。《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4(2): 261-287。
- 湯京平、陳冠吾，2013，〈民主化、派系政治與公民社會：以嘉義縣的社區營造與「終結派系」為例〉。《台灣民主季刊》10(2): 105-137。
-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傳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群學。
- 鄭瑋寧，2017，〈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魯凱人的日常金融實踐與經濟生

- 活》。頁 247-326，收入黃應貴、鄭瑋寧主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台北：群學。
- ，2019，〈「權力」、情緒與分歧的未來：當代 Taromak 魯凱人的政治社群性〉。頁 299-372，收入黃應貴、林開世主編，《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台北：群學。
- 鮑建信，2019，〈更一審大逆轉，立委簡東明賄選案，12 人全改判無罪〉。自由時報，4 月 3 日。
- 盧道杰、闕河嘉、黃書娟、林鴻忠、汪中仁，2011，〈社區培力與資源保育：我國社區林業政策評析〉。《台灣政治學刊》15(1): 137-204。
- 譚昌國，2009，〈當代排灣族頭目權威的建構：以土坂村 Patjalinuk 頭目家為例〉。《原住民自然人文期刊》創刊號：145-176。
- 羅欣貞，2020，〈屏東原鄉分裂投票，伍麗華衝出好成績〉。自由時報，1 月 13 日。
- Anciano, Fiona. 2017. "Clientelism as Civil Society? Unpac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entelism and Democracy at the Local Level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3(4): 593-611.
- Anderson, Perry. 1976.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5-78.
- Auyero, Javier. 1999. "'From the Client's Point(s) of view': How Poor People Perceive and Evaluate Political Clientelism." *Theory and Society* 28(2): 297-334.
- Benhabib, Seyla. 1992. "Models of Public Spher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ürgen Habermas." Pp. 73-98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enit-Gbaffou, Claire. 2011. "'Up Close and Personal'—How Does Local Democracy Help the Poor Access the State? Stories of Accountability and Clientelism in Johannesburg."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6(5): 453-464.
- Burawoy, Michael. 1982.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gwal, Gerrit. 1995. *Struggle of the Poor: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Clientelist Practice in a Quito Squatter Settlement*. Amsterdam: CEDLA.
- Calhoun, Craig ed. 1992.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1947.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田立年譯，2007，

-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 2001. “O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 Pp. 165-178 in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edited by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aroff, John L., and Jean Comaroff. 2009. *Ethnicity, In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wson, Hannah J. 2014. “Patronage from Below: Political Unrest in an Informal Settlement in South Africa.” *African Affairs* 113(453): 518-539.
- Eley, Geoff. 1992. “Nations, Publ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s: Placing Haberm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289-339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scobar, Arturo. 1988. “Power and Visi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hird Wor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428-443.
- .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James.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ox, Jonathan. 1994.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Lessons from Mexico.” *World Politics* 46(2): 151-184.
- . 2012. “State Power and Clientelism: Eight Propositions for Discussion.” Pp. 187-211 in *Clientelism in Everyday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edited by Tina Hilg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raser, Nancy. 1992.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Pp. 109-142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ay, Robert. 1998. “Rethinking Clientelism: Demands,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Brazil.”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65: 7-24.
-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o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2008. “Diverse Economies: 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 ‘Other Worl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13-632.

- Goody, Jack. 2001. "Civil Society in an Extra-European Perspective." Pp. 149-164 in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edited by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Colin. 1991.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Pp. 1-52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nn, Chris and Elizabeth Dunn, eds. 1996. *Civil Society: Challenging Western Models*. London: Routledge.
- Hicken, Allen. 2011. "Cliente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289-310.
- Kaviraj, Sudipta. 2001.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Pp. 287-323 in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edited by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elt, Herbert and Steven I. Wilkinson. 2007.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 An Introduction." Pp. 1-49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ited by Hebert Kitschelt and Steven I. Wil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attoni, Simona, ed. 2001.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Nikolas and Peter Miller. 1992. "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3(2): 173-205.
- Ryan, Mary P. 1992. "Gender and Public Access: Women's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Pp. 259-288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ampson, Steven. 1996. "The Social Life of Projects: Importing Civil Society to Albania." Pp. 119-140 in *Civil Society: Challenging Western Models*, edited by Chris Hann and Elizabeth Dunn. London: Routledge.
- Scott, James. 1972.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 91-113.
- .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omers, Margaret R. 1995. "Narrating and Naturalizing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hip

- Theory: The Pla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blic Sphere.” *Sociological Theory* 13(3): 229-274.
- . 2008. *Genealogies of Citizenship: Markets, Statelessness, and the Right to Have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